

#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

■ 赵克生

在儒家政治背景下,孔庙祀典作为学术与道统的象征,它操纵于国家,充当了润饰政治和教化臣民的精神工具。明代孔庙祀典承继了历史的积淀,洪武以后孔庙祀典不断上升,目的是借孔子之道厉行“教化”。嘉靖九年,明世宗缘于“大礼议”之际士儒以“道统”对抗君权,屡次反对礼制改革,故而世宗通过降杀孔庙祀典,打击士气,显现君权。

[关键词]明代;孔庙;祀典;升降

[中图分类号]K248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4-518X(2004)06-0104-07

赵克生(1967—),男,安徽舒城人,历史学博士,皖西学院副教授,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。(天津300071)

关于孔庙的代表性研究成果,主要有台湾学者陶希圣、高明士、黄进兴和大陆学者胡务等人著作<sup>[1]</sup>,特别是黄进兴先生《道统与政统之间:从明嘉靖九年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》一文专论明代孔庙祀典,给本文不少启发。本文将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,着重勾勒出明代孔庙祀典的变化轨迹,并对黄进兴等人关于明代孔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某些补充和修正,如明洪武初不通祀孔子的原因分析,嘉靖初庙学为何遍立敬一亭等。

## 一、明代以前孔庙祀典的基本概况

孔庙祀典基本定型于唐朝,以后在此基础上时有变动,其中三个方面值得注意:

(一)孔庙祀典的彰显。牟宗三先生曾从儒学演变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,他说:“宋以前是周孔并称,宋以后是孔孟并称。周孔并称,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骥尾。对后者(孔子)言,只是传经之媒介,此只是从外

部看孔子,孔子并未得其应得之地位……但孔孟并称,则是以孔子为教主,孔子之所以为孔子,始正式被认识。”<sup>[2]</sup>就祀典而言,同样如此,唐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,追谥先圣孔子为“文宣王”,王者冕服,南面而坐,十哲东西侍列,孔子祀典升为中祀。

宋朝文治特盛,孔子祀典又视前朝有加。真宗加谥元圣文宣王(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),徽宗崇宁三年(1104年)孔子用天子冕,增为十二旒。

元大德十一年(1307年)再加封“先孔子而圣者,非孔子无以明;后孔子而圣者,非孔子无以法。所谓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仪范百王,师表万世者也。可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,遣使阙里,祀以太牢。”<sup>[3]</sup>名号加大成,祭祀仪物由少牢(羊)升格为太牢(牛)。

随着历史的演进,孔子地位不断提高,孔庙祀典不断彰显。其中原因为明宪宗一语道破,他说:“自孔子后,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,其君虽有贤愚之不同,孰不赖孔

子之道以为治?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,愈远而愈盛”<sup>[4]</sup>

(二)庙、学相依格局的形成。贞观四年(629年),诏令州郡学皆立孔子庙,孔庙由阙里、国学而遍及天下。

古者入学,则释奠于先圣先师,明圣贤当祠之于学也。自唐以来,州县莫不有学,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。<sup>[5]</sup>

不过,有学者提出,唐宋时庙、学分离的情况很普遍,一直到元朝,学宫与孔庙进一步结合,相互表里,“由学尊庙,因庙表学”。孔庙与学宫的位置一般为,前庙后学,或左庙右学,以示尊崇。<sup>[6]</sup>从此庙、学相依,成为制度。在庙学时代,其校园是由教学与祭祀两个空间构成,从事教育者除被要求做经师外,更重要的还要做人师,其典范就在庙堂。<sup>[7]</sup>孔孟之道的传授也是双途并用:经书的学习和祭礼的强化。孔庙祀典成为儒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二者相为表里。

学者必释奠于先师...示敬道也。其学有庙又如此,盖明有礼乐、幽有鬼神,用礼乐以教士于昭昭之际,而必致敬于冥冥之中,非独以报始教者之功德,实所以定入学者之心志也。<sup>[8]</sup>

庙以尊圣贤,政教之所由出了也;学以养士子,政教之所由行也。入圣贤之庙,见圣贤之像则肃然起敬,而有愿学之心。<sup>[9]</sup>

贞观以降,天下学校、孔庙都是由朝廷自上至下推动而建立的,各地孔庙则入国家系统,成为官庙的一环。<sup>[10]</sup>既为官庙,其祀典便由国家举行,贞观二十一年(646年)定孔庙祀典:国学,天子视学亲为释奠外另将遣官行礼;州县以守令主祭。历代孔庙配享、从祀诸儒的遴选都是出自朝臣之廷议,决诸皇帝之钦定。

可以说,孔庙祭祀操纵于国家,其目的在于厉行“教化”。祀孔表明,国家厉行教化的根本内涵就是孔子之道,它由孔孟以至程朱,一脉相承,追求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理想化的礼制秩序。礼义的差序格局对应了现实政治中的等级秩序,它突出“君尊臣卑”,从而使皇帝“知为皇帝之贵”,使群臣、百姓各有等差,在等级秩序中各安其份,由此便可以形成有序的社会。这样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,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,历代统治者以礼乐为治的根本原因莫过于此。孔子之教因而也被称作“礼

教”,崇祀孔子,也就是推崇“礼教”。正如明人徐程所说“……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,载之于经,仪范百王,师表万世,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,孔子力也。孔子以道设教,天下祀之,非祀其人,祀其教也,祀其道也。”<sup>[11]</sup>

(三)孔庙的道统象征。王夫之说:“天子之位也,是谓治统;圣人教也,是谓道统。”<sup>[12]</sup>而治统一词又通常与政统或君统互用。道统一词也与学统互用。“圣人教”就是儒家道统,亦为孔孟之学统。

道统之说首倡于唐代韩愈。他在《原道》一文里,首先提出一个圣人传道的统绪,以是传之舜,舜以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孟轲死,不得其传。至宋,理学兴起,理学家为了论证自己学说是承接圣人传道统绪的儒学正宗,大力倡道统之说。程颐是首倡此说的理学家,他称其兄程颢生于千四百年之后,得不传之学于遗经,圣人之道得程颢而后明,认为程颢是孔、孟之后承接圣人之道道统继承人。朱熹编《伊洛渊源录》把道统论引进了理学史研究的领域,为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,明人黄仲韶在《伊洛渊源录新增序》里说:“故朱子著《伊洛渊源录》一编……所以著明其上承孔孟之统,下启关、闽之传。”<sup>[13]</sup>孔庙道统谱系是由孔子及配享、从祀孔庙的历代诸儒来体现。

儒家道统有依赖政治(政统)的一面,同时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。道统的独立性使之对政治构成了一种制约。“仁义礼乐”是儒家之道,政治对儒道的汲取是为了建立有序社会,实现专制统治。权力得到儒道的粉饰,使现实中的王(皇帝)得以圣化,因而可以标榜自己的统治继承了传统的“先王之治”。在“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历代相传的神圣法则”的古代中国,儒道成为维护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基础。<sup>[14]</sup>这决定了政统总要向道统切近。不可忽视的是,作为社会控制机制的儒道犹如一把双刃剑。它在确定君臣、父子各得其位,可能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,也要求君像理想之君,父像理想之父。以君王而论,理想之君就是“圣王”,他不仅取得王位,还应该通过修身体现“仁义礼智信”等德性,循圣人之道而为治。于此,担当“道统”的儒士自觉与王者可以比肩了。孟子曾言:“以位,则子,君也;我,臣也;何敢与君友也?以德,则子

事我者也,奚可以与我友? ”<sup>[15]</sup>所谓道尊于势,即如孟子之言。后世儒士无疑继承了先儒“为王者师”的传统,明儒吴沈说:

“若夫子则不得君而为师者也。师也者,君之所不得而为臣者也。故曰虽诏于天子,无北面,所以尊师也。”<sup>[16]</sup>

吴氏之语透露了后世儒士的“以道自尊”,孔庙作为道统的制度化,必然为他们“以道自尊”提供不竭的心力,成为他们规范君权、使政治理性化的精神支柱。

## 二、明代嘉靖以前孔子祀典的不断上升

明初孔子祀典沿用宋元之制。先师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王;以颜回、孟子、曾子、子思配享先师,“从祀名儒”仍宋元之旧。<sup>[17]</sup>洪武元年,刚刚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就依照先朝祀孔惯例,诏以太牢于国学祀先师孔子,仍遣使谒曲阜致祭。

仲尼之道,广大悠久,与天地相并,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,修其祀事。朕今为天下主,期在明教化,以行先圣之道。今既奠国学,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,尔其敬之。<sup>[18]</sup>

朱元璋的祀孔具有象征性。通过祀孔、尊孔,朱元璋规定了帝国的政治文化取向,他明确指出“明教化,以行先圣之道”,即以孔子之道教化臣民,确立了礼义教化的指导思想与理论观念。<sup>[19]</sup>早在丙申(1356年)五月,朱元璋就曾说“孔子之言,诚万世之师也”<sup>[20]</sup>以后又不断强调“孔子明帝王之道,以教后世,使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纲常以正,彝伦攸序,其功参于天地。”<sup>[21]</sup>

以孔子为师而行先圣之道,在元明易代、人心未附之际,还表达了“恢复中华”的政治理念,同政治上的“攘夷复夏”相呼应。儒学以伦理分善恶,区别君子与小人;以礼教分人禽,区别华夏与夷狄。洪武二年(1369年)十月,朱元璋说:“学校之教,至元其敝极矣。使先王衣冠礼乐之教,号为夷狄,上下之间,波颓风靡,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……朕恒谓治国之要,教化为先,教化之道,学校为本。今京师虽有太学,而天下学校未兴,宜令郡县皆立学,礼延师儒,教授生徒,以讲论圣道,使人日渐月化,以复先王之旧,以革污染之习。此最急务,当急行之。”<sup>[22]</sup>孔子之道区别了华夏与夷狄,因而具有了提高政治认同

感,巩固明朝统治的作用。

无论是恢复礼义秩序,还是提高政治认同、巩固统治,礼义教化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在礼、法之间,朱元璋以礼义教化为先,洪武四年(1371年)六月太祖退朝御东阁,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,太祖曰:“教化必本诸礼义,政刑岂宜先之?敬徒急于近效,而严其禁令,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。”又说:“本于心者,道德仁义,其用无穷;由乎法者,权谋术数,其用有时而穷。”<sup>[23]</sup>礼义能格心之非,促使道德的内化,比法律能更持久、有效地维持统治。

厉行教化,使孔子之道“落地生根”,深入人心,得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,必须有赖经书典籍、学校的传播。为此,洪武二年十月,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。据统计,洪武时所重建、创建的学校达一千多所,其中新建学校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南边疆地区。<sup>[24]</sup>因为西南地区长期以来声教不及,而北方战乱频繁,元人统治的时间较长,染胡俗较深。为解决北方师资和书籍,洪武八年(1375年)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,给廪食、赐衣服分教北方;洪武十四年、二十四年,二次颁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等儒家经典于北方。从“得土得人”的政治角度看,北方理应作为教化的重点,以便让孔孟“礼教”发挥一种“文化水泥”的作用,来抹平南北的差异、夷夏的区别,巩固从分裂、战乱中建立的明政权。

尊崇孔子与厉行教化的内在关联,使朱元璋对孔子祀典也倍加注意。洪武三年(1370年)诏定岳镇海渚城隍诸神号,凡岳镇海渚并去其前所封名号,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;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名号,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。但孔子封爵仍旧,“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,为天下师,以济后世,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,所有封爵宜仍其旧”<sup>[25]</sup>洪武四年定祭祀仪物,改初制笾豆之八为十,牲易以熟,用乐舞生一百一十八人,供释奠宗师之用。<sup>[26]</sup>

洪武十五年(1382年)前,天下还未通祀孔子,这在当时引起了宋濂、钱唐、徐程等人反对或议论。钱唐,字惟明,象山人,博学敦行。洪武元年,举明经,对策称旨,特授刑部尚书。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,止行于曲阜,天下不必通祀。钱唐伏阙上疏言:“孔子垂教万世,天下共尊

其教,故天下得通祀孔子,报本之礼不可废。”侍郎程徐亦疏言:“古今祀典,独社稷、三皇与孔子通祀。天下民非社稷、三皇则无以生,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皆圣人也。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,载之于经,仪范百王,师表万世,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,孔子力也。孔子以道设教,天下祀之,非祀其人,祀其教也,祀其道也。今使天下之人,读其书,由其教,行其道,而不得举其祀,非所以维人心、扶世教也。”<sup>[27]</sup>

朱元璋不通祀孔子的具体原因,史乏明言,后人也有臆测。<sup>[28]</sup>但揆诸当时形势,本文认为主要是庙学时代,依学立庙,历经长期战乱,天下学校严重废毁,庙亦不存,故一时难以通祀。经过十几年的建设,情况大有好转之后,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便下令天下通祀孔子,赐学粮,增师生廩膳。太祖对礼部尚书刘仲质说:“……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,而报祀之礼,止行京师,岂非阙典?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,颁之天下学校,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。”<sup>[29]</sup>洪武十七年(1384年),又定有司释菜仪,每月朔望,祭酒以下行释菜礼,郡县长以下诣学行香。二十六年(1393年)颁大成乐于天下。

洪武以后的继续诸君仍然尊崇孔子有加。永乐四年(1406年),明成祖躬诣太学释奠先师,绍继洪武仪注:服皮弁,行四拜礼。<sup>[30]</sup>洪熙元年(1425年),仁宗赐奉承先师之祀的衍圣公一品金织衣(衍圣公是二品)并说“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国天下……其赐之,用称朕崇儒之意。”<sup>[31]</sup>成化十二年(1476年),国子监祭酒周洪进奏:“圣朝因(宋元之旧制)则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礼,佾舞乃用诸侯之乐。以礼论乐则乐不备,以乐论礼则礼为僭。乞敕廷臣计议,增筵豆为十二、佾数为八,则佾舞与冕服相称。礼明乐备,可以格圣灵,厚风化,补前代缺略之典,备圣朝尊崇之制。”宪宗以尊崇孔子乃国朝盛典,宜从所言,其筵豆佾舞俱如数增用,仍通行天下遵此制。<sup>[32]</sup>四年后又定,天下学校孔子庙庭所在,凡遇门下马。<sup>[33]</sup>至此,孔子祀典不仅遵用前朝的天子冕服之制,乐舞、祭物也升用天子之仪,孔子的王者形象更加丰满。

### 三、嘉靖九年世宗对孔子祀典的降杀

嘉靖九年,大学士张璁根据明世宗旨意拟出的孔子

祀典改制提案交礼部,会内阁、詹事府、翰林院诸臣议正:

“人以圣人为至,圣人以孔子为至。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,其意已备。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,去其王号及大成、文宣之称,改大成殿为先师庙,大成门为庙门。其四配称复圣颜子、宗圣曾子、述圣子思子、亚圣孟子。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,皆称先贤某子。左丘明以下,皆称先儒某子,不复称公侯伯。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規制,制木为神主,仍拟大小尺寸,著为定式。其塑像即令屏撤。春秋祭祀,遵国初旧制,十筵十豆。天下各学,八筵八豆。乐舞止六佾。”<sup>[34]</sup>

诸臣所议本于张璁,世宗准议而行,随成定制。嘉靖九年之制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变动:

(一)谥号有变。孔子只称至圣先师孔子,去其王号及大成、文宣之称。

(二)大成殿改称孔子庙。所谓“学必有庙以祀孔子……孔子尊视王者,衮冕南向,故庙制有四柱,屋扁曰大成殿”<sup>[35]</sup>既不称文宣王,也就改殿为庙。

(三)殿塑像,用木主,去章服。明代用木主起于洪武十五年,但此后塑像渐复。既塑像就得有章服,故明朝依宋元旧制,用天子冕服。嘉靖用木主,故去章服,同去王号一致。且木主较洪武之制有降杀。洪武定大成文宣王木主,长三尺三寸五分,连上云、下座,共五尺二寸;阔七寸,连左右云,共一尺一寸五分。嘉靖九年改制,定至圣先师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,阔四寸,厚七分;座高四寸,长七寸,厚三寸四分。<sup>[36]</sup>四配、十哲、先贤、先儒之木主俱如是。

(四)减祀仪。宪宗用周宏谟之议,由明初“乐舞六佾,筵豆各十”增为“乐舞八佾,筵豆各十二”,世宗对此甚为不满,竟然指责其皇祖考“上拟事天之礼,略无忌焉。孔子设或在今,肯安享之乎?”因而降为“十筵十豆。天下各学,八筵八豆。乐舞止六佾。”<sup>[37]</sup>

世宗对孔子祀典的降杀是以孔子是周臣、不当僭称王号为理由,改革祀典是为正名循实。事实果如其言?世宗《正祀典申说》有一段话或能说明问题:“(唐)元宗封谥孔子,何不以皇帝加之,是不欲与之齐也。特一王号,犹封拜臣下耳,尊崇之意何在哉?……宋徽宗荐十二章

服,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设此以尊崇耳,况以诸侯王而荐天子之服章,诬之甚也。<sup>[38]</sup>世宗对先代帝王尊宗孔子之礼的剖析,透视出世宗对孔子祀典改制政治意义的思考。这让人不得不追问:世宗本人更改孔子祀典,其用意何在呢?其中十三道御史黎贯等人诘问的最为有力:

“至于孔子则疑其王号为僭而欲去之,昔太王、王季未尝王也,周公、成、文、武之德追而王之,天下未常以为僭。我圣祖登极之初即进尊德祖、懿祖、熙祖、仁祖为皇帝,是亦周公推本之意,而不以位论也。至于臣子有大勋劳如魏公徐达等身歿之后,进爵为王,亦或追封及其祖、考,是皆生未有王号,没而追之也。”

世宗于此处读出了黎贯等的机锋所在,“(黎)贯等意谓朕何等君也,追尊皇考而为皇帝号,孔子岂不可,本意如此,乃以太祖追尊加四代而言,奸巧恶逆甚矣,”理屈词穷之际世宗乃用故套,以势取胜,他说:

“君父有兼师之道,师决不可拟君父之名。孔子本臣于周,与太公望无异。所传之道,本羲、农之传,但赖大明之耳,否则不必言祖述尧舜。”<sup>[39]</sup>

世宗由此托出了文庙改制的底蕴,以君统来压制师之道统。当时已有人指出,世宗以位而凌先师,使自己君师兼任,理、势合一。明人沈德符说“孔庙易像为主,易王为师,尚为有说。至改八佾为六,笾豆尽减,盖上(世宗)素不乐师道与君并尊。”<sup>[40]</sup>

世宗与儒士争道统,是源于“大礼议”的影响。世宗以藩王入主大统,对其逝父亲兴献王追加皇帝之礼,为的是通过礼制重塑帝系正统,变小宗为大宗,为自己继承皇位的天然合法性作论证。此举遭到杨廷和、毛澄、杨慎等大臣的批评和抵制,他们在批评世宗礼制改革时常常援引先贤先儒之言,贬黜、流徙之际士气高涨。《明史》谓“主威愈震,而士气不衰,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。”<sup>[41]</sup>这使世宗看到儒臣“列道而议”背后的底气所在,即千百年来儒士们用心力构筑的孔孟、程朱相传之道统提供了他们不竭的勇气。世宗说:“……孔子称王咸谓可者,徇私意耳。借之以制压君于上,威服人于下,虽曰尊孔子,实是自尊也。”<sup>[42]</sup>为了打压士气,世宗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,降杀孔庙祀礼。使孔庙体现的道统屈服于君

统之下,宣称君统才是道统所在,君可以兼任师,而师不可僭君。

世宗在“破”之时还有“立”,其一是圣师之祭。嘉靖九年初,祭祀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十一位。其中九圣南向,左先圣周公、右先师孔子东西向。每岁春秋开讲前一日,皇帝服皮弁拜跪,行释奠礼,祭于文华殿东室。十六年世宗移祀于永明殿后行礼如初,其后遣官代祭,隆庆初仍于文华殿东室行礼。<sup>[43]</sup>天子之学,所习二帝、三皇、文、武之道,道统以伏羲为宗,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驥尾。以牟宗三先生的理论,嘉靖皇帝把孔子附于道统之末,对孔子而言,只是传经之媒介,是以王者为中心,从外部看孔子。世宗为此,显然是要把君统置于道统之上,体现的还是君可兼师的政治理念。

其二是立“敬一亭”。敬一亭得名于世宗御制的《敬一箴》,其曰:

人有此心,万理咸具。体而行之,惟德是据。敬焉一焉,所当先务。匪一弗纯,匪敬弗聚。元后奉天,长此万方。发政施仁,斯保鸿图。敬怠纯驳,应验顿殊。征诸夫人,如鼓答桴。朕荷天眷,为民之主。德或不类,以为大惧。惟敬惟一,执之甚固。畏天勤民,不遑宁处。日敬维何?怠荒必除。效则恭诚,庙严孝趋。肃于明廷,慎于闲居。省躬察咎,儆戒无虞。日一维何?纯乎天理。弗叁以三,弗贰以二。行顾其言,终如其始。静虚无欲,日新不已。圣贤法言,备见诸经。我其究之,择善必精。左右辅弼,贵于忠贞。我其任之,鉴别必明。斯之谓一,斯之谓敬。君德既修,万邦则正。天亲民怀,永延厥庆。光前垂后,绵衍蕃盛。咨尔诸侯,卿与大夫,以至士庶,一遵斯谟。主敬协一,罔敢或渝。以保禄位,以完其躯。古有磐铭,目接心警。汤敬日跻,一德受命。朕为斯箴,拳拳希圣。庶几汤孙,底于嘉靖。

世宗对“敬一”作了解释。他说:“夫敬者,存其心而不忽之谓也。元后敬,则不失天下;诸侯敬,则不失其身……一者,纯乎理而无杂之谓也。伊尹曰,德惟一,动罔不吉;德二三,动罔不凶。”<sup>[44]</sup>从其意思看,敬一乃由程朱“持敬”之学寻绎而出,世宗认为帝王以至士庶都要惟敬惟一,修身培德,行纯王之道,可以致太平之治,亦即“内

圣而外王”的道理。

《敬一箴》作于嘉靖五年(1526)十月,世宗同时还注解了宋儒范浚“心箴”和程颐视、听、言、动四箴,颁赐大学士费宏等。总体上说,《敬一箴》及《五箴注》是世宗读书有得而作,本无神秘伟大之处。但在费宏、张璁等人的阐释下具有了政治意义。按张璁的解释,范浚心箴与程氏四箴成为一体,范浚心箴举其纲,程氏四箴列其目。明世宗所著敬一箴,及注以上五箴,都是发明心学,“非特尧舜之治见于天下,而尧舜心法之秘、道统之传固有在矣。”<sup>[45]</sup>因此,敕工部于翰林院盖亭竖立,以垂永久。仍敕礼部通行两京国学并所在提学官等摹刻于府、州、县学,使天下人士服膺圣训,有所兴起。<sup>[46]</sup>于是两京国学、府、州、县学陆续兴建敬一亭。

《敬一箴》及其五箴注成了尧舜心法之秘传,成了道统之所在,那么天下学校所立敬一亭也就成为道统的象征。随后的孔庙改制就是在敬一亭的鄙视下进行的。在时间上,敬一亭之建虽稍早于孔庙改制,但各地建亭和孔庙改制基本是相辅而行,敬一亭之建改变了庙学空间,它同孔庙形成对峙和抗衡。世宗通过立敬一亭来重建道统象征,从而否定儒士构建的道统,对孔庙祀典的降杀就是要突出敬一亭的道统象征地位。于此,我们看到了权力对孔庙祭祀象征性的操纵。

综上所述,嘉靖朝可以看作明代孔庙祀典升降的分界线,明后期实行的就是嘉靖新礼,孔庙祀典的再次抬升是在明清易代之后。

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陶希圣. 孔子庙庭中汉儒及宋儒的位次 [J]. 食货. 月刊(复刊)第二卷第一、二期;陶希圣. 孔子的学统与道统 [J]. 食货. 月刊(复刊)第八卷第三、四期。  
黄进兴. 权力与信仰: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[M]. 收入氏著《优入圣域:权力、信仰、正当性》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8。  
高明士. 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——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 [M]. 文史哲学报. 第四十期,台湾大学,1993。  
胡务. 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 [M]. 元史论丛. 第八辑,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1。  
[2] 牟宗三.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[M]. 中国广播

电视出版社,1993. 222-223.

- [3] 王圻. 续文献通考. 卷四八. 学校二 [Z]. 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0。  
[4] 明宪宗御制. 重修孔子庙碑(成化四年) [Z]. 骆承烈. 石头上的儒家文献(上) 齐鲁书社,2001. 403。  
[5] 马端临. 文献通考卷四三. 学校四 [M]. 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0。  
[6] 胡务. 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 [M]. 元史论丛. 第八辑. 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1。  
[7] 高明士. 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——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。  
[8] 弘治中. 易州志. 卷一六. 重修学庙记. 天一阁本。  
[9] 万历. 黄岩县志. 卷二. 皇明章恭毅公纶修学记 [Z]. 天一阁本。  
[10] 黄进兴. 优入圣域. 231。  
[11] [27] 明史. 卷一三九. 徐程传. 钱唐传 [M]. 中华书局,1997。  
[12] 王夫之. 读通鉴论. 卷一三. 东晋成帝 [M]. 中华书局,1975。  
[13] 卢钟锋. 中国传统学术史 [M]. 河南人民出版社,1996. 138-145。  
[14] 刘泽华.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 [M]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0. 76-77。  
[15] 孟子·万章下。  
[16] 吴沈. 孔子封王辨 [M]. 黄训. 名臣经济录. 卷三 O [M]. 四库全书本。弘治中,太监何文鼎因国舅张鹤龄屡次违禁入宫,仗剑欲诛之。事为孝宗所知,收缚文鼎,面讯曰:“汝内臣安敢如此,是谁主使?”文鼎说:“主使者二人,皇上亦无如之何。”孝宗问:“彼为何人而我无之何?”文鼎曰:“孔子、孟子。”何文鼎以孔、孟教人为忠为孝之道理,此种儒家之道理是皇帝也不能违抗的,故敢抗论孝宗。它反映了儒学规范君权的一面(韩邦奇. 苑洛集卷一九. 见闻考随录二 [M]. 四库全书本)。  
[17] 大明集礼. 卷一六. 释奠文宣王. 四库全书本。  
[18] [21][23][25] 明太祖实录卷三〇,洪武元年二月;卷一四四,洪武十五年四月;卷六六,洪武四年六月;卷五三,洪武三年六月癸亥。台湾中研院校勘本。  
[19] 张显清. 试论明太祖“以教化为本”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[J]. 明史研究. (7)。  
[20] [22] [29] 朱元璋. 宝训. 卷二. 圣学; 卷一

兴学 张德信. 洪武御制全书[Z]. 黄山书社, 1995.

[24] 郭培贵. 洪武时期府州县学设置及其特点考述[J]. 内蒙古师大学报, 1996, (3).

[26] 大明集礼. 卷一六, 载洪武初制, 四库全书本.

[28] 黄进兴认为明初不通祀孔子的原因在于, 朱元璋源于孔克坚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怠慢, 欲显“治道”尊荣, 有意对孔庙象征的道统进行压制, 并认定宋濂就是要求通祀孔子而被迁。见氏著《优入圣域 权力、信仰、正当性》[M]. 169—173.

[30] 李之藻. 宫礼乐疏. 卷一, 四库存目丛书本.

[31] [32] 俞汝辑. 礼部志稿. 卷三、卷九四, 四库全书本.

[33] 明宪宗实录[Z]. 卷二00, 成化十六年二月辛亥.

[34] [41] [43] 明史. 卷五0. 至圣先师孔子庙祀; 卷二0九. 赞语.

[35] 尹直. 重建文庙记. 嘉靖. 句容县志. 卷九, 天一阁本.

[36] 孙承泽. 春明梦余录. 卷二一. 文庙[M]. 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92.

[37] [39] [46] 明世宗实录. 卷一一九, 嘉靖九年十

一月; 卷一一九, 嘉靖九年十一月; 卷六九, 嘉靖五年十月.

[38] 秦蕙田. 五礼通考. 卷一二0. 祭先圣先师[M]. 四库全书本.

[40] 沈德符. 万历野获编[M]. 卷一四, 中华书局1997年. 这一思想此后又有所表现, 如嘉靖二十六年三月, 策试天下贡士, 世宗制策有: “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, 任君师治教之责。是故, 道统属之有不得而辞焉者。”

对于道统谱系, 儒者有自己的安排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曾说,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, 至孟轲而止。孟子则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, 皋陶、伊尹、莱朱、太公望、散宜生之为臣, 各有闻知、见知之殊。

世宗不满韩愈“各有闻知、见知之殊”的说法, “果若是般, 与其讲求著述之功劳可与行道者并欵, 抑门人尊尚师说, 递相称谓而忘其僭。”又说: “唐宋而下虽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, 其间英君谊辟, 抚世宰物而德泽加于四海、功烈著诸天地者, 不可概少, 果尽不可以当大君道统之传。”世宗遂列出明太祖、成祖, 列圣相承至于世宗本人, 也是远绍二帝三皇大道之统(见. 明世宗实录卷三二一)。

【责任编辑 陈希实】